

余嘉锡致赵万里、王重民两君函一通铨解

柳向春

内容摘要:新见余嘉锡先生手书一函,是写给赵万里、王重民两位先生的,其中所言,颇可反映陈垣、余嘉锡、王重民、赵万里四位的学术与交游。本文以此信为基点,并征引其他文献为助,解析余嘉锡《古名家杂剧跋》一文的撰作以及修正过程,以及在撰作和修正过程中,所获得的陈垣与赵万里的帮助和批评。从而得以管中窥豹,获知诸位先生互相切磋学问、商略史实的过程与态度。纠正前人对一些信札的系年问题,发现了一些尚未被人注意到的佚文。而这封信本身所涉及到的内容,又牵涉到陈垣、余嘉锡、王重民对《四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关键词:余嘉锡 赵万里 王重民 书札 乾隆朝档案 《四库》学

中国现当代的文献学家中,陈垣、余嘉锡、王重民、赵万里和王大隆、张舜徽等几位,可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现今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础,基本上就是在这几位的研究成果上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几位,是现代中国文献学的奠基人。但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什么交往?学术上是否曾互相影响?一直以來,似乎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实在令人遗憾。日前,偶见余嘉锡先生手书一函,是写给赵万里、王重民两位先生的,其中所言,颇可反映陈垣、余嘉锡、王重民、赵万里四位的学术与交游,所探讨的,也都是在学术史上值得深入挖掘的话题,因此很值得仔细研读。故不揣浅陋,略为之铨解,以供素心人采撷。

余函云:

斐云、有三两兄先生阁下:

日昨奉谒,畅聆麈谈,甚以为快!以两君之盛年积学,对之令人汗下。弟拙著虽录入《文学副刊》,然以行篋无书之故,并通行之《汇刻书目》亦未之检阅。读《副刊》编者按语,深以为愧。归后即走访傅沅叔索书,渠

云有友人陶君者欲暂假一观，因之未及取回。然少需时日，终当践录副之约也。

前日谈次偶及周栻园著述撤出《四库全书》，有三兄谓只以其为贰臣之故。弟则终以为必有其它原因，遂举以询陈援庵。顷得报书，附录档案不独可解决栻园著述问题，并足补有三兄大著《李清著述考》所未及。援庵囑为转达，兹特别纸钞呈。得此，则所钞未刻提要亦可发表矣。鄙见所及亦附案语于后，惟未知是否，尚希鉴察。本欲走访，恐公冗不便相扰。手此布臆，即颂著祺。

弟余嘉锡顿首，三月廿九日。

正封函间，适奉贵馆赐函，所言已详此函中，恕不另行截复。又及。^①

这封信实际上是在讲两件事情，前一段是在说余先生自己发表的一篇文章，后一段则在说陈垣提供的一段新材料。函中并没有提供明确的时间线索可供系年。不过，通过其他一些文献佐证，其实是可以设法确定其写作年份的。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收有一通标注为1928年3月28日陈垣致余嘉锡先生的函件，云：“季豫先生撰席：顷奉手示，敬悉。昨在报中拜读大著，至为佩服。承询周亮工著述撤出《四库》原因，据乾隆档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在覆勘文渊等阁所藏《四库全书》，据详校官祝瑩签出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内有违碍猥亵之处，已照签撤改矣。祝瑩着交部议叙，钦此。所谓违碍者，因《读画录》诗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馀’之句也。所谓猥亵者，因《书画记》有《春宵秘戏图》也。此事年前王君似曾询及，事冗未暇详答，晤时乞转致为荷。”^②所言显然与本文所引之余氏致王、赵两公信中内容相接，正是该函前一日所撰者。而根据上述余嘉锡致王重民函部分来看，显然，这封信应该是作于《李清著述考》发表之后而非之前。又陈垣函中提及的王君，显然指的就是王重民先生。今考王重民《李清著述考》一文原刊于《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其时为1928年9月。文中附录陈垣致王重民函一通云：“重民仁兄足下：承询李清《南北史合注》诸书被摈弃于《四库》原因，此事发现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系因清所著《诸史同异录》有违碍语，而连累及于清所著他书，均行撤出。鲍刻《简明目录》系据乾隆四十七年赵怀玉在四库馆传抄本，故未将诸书撤出。今录上此事谕旨一通，此旨不载《东华录》及《圣训》，并不见于军机处档案，系在内阁大库内之乾隆五十二年《起居注》册录出，诚希见之史料也。因关于《四库》事，私家记载不甚敢言，故资料极缺乏（下略）弟陈垣谨覆，五月八日。”对照之前所揭文献，可知这封信就是前引陈垣致余嘉锡先生函中所曾提及的“此事年前王君似曾询及，事冗未暇详答”一事。此信未见于《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可以补其遗缺，为陈、王两位之交往补足

①中国嘉德2016年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图录，第2356号拍品。

②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67-368页。

文献。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李清著述考》中所述,可以发现,上引1928年3月28日陈垣先生致余嘉锡的信,系年恐怕有误。综合以上各种信息可以判定,其实陈先生这封信作于1929年度。与之相关的是,本文所探讨的余嘉锡先生的这封信,也应该作于该年,即作于1929年3月29日。

二

陈垣弟子牟润孙在《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一文中,曾经描述过陈、余两先生相识的情形:“援庵先生在北京授课时,余嘉锡(季豫)先生的儿子余逊(让之)是他的学生。援庵先生看让之的作业,觉得他学有渊源,与一般学生不同,便问让之从何人授业,让之说明幼承庭训。那时季豫先生正在赵尔巽家中课读,让之随侍在京。援庵先生向让之表示,希望能与季豫先生一见。后来季豫先生去看了援庵先生。”^①陈垣在余嘉锡遗作结集出版时所撰序中,也提及了与余先生交往的情形,云:“季豫先生湖南常德人,一九二七年入京不久,他就来看我。我们谈起彼此治学的经过,各有甘苦,颇能契合。后来他到辅仁大学中文系任教,见面的机会较多,研史论学,互有启发,每谈至深夜,不知疲倦。”又云:“今观集中所收的论文,很多都是抗战前后我们曾经商讨过的,今天重读,记忆犹新。看到他散在杂志报章的文章,得以编辑出版,非常高兴,同时也不能不增加对老友怀念。”^②凡此都可以看出陈、余二先生当日切磋琢磨、彼此论学时的情形。而两人的友谊,也在本文征引的这些信函中,再次得到验证。

另外,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还有一通落款十一月二十日的余先生来函,末云:“近日所著有《宋江平方腊考》、《古名家杂剧跋》二篇,缓当缮写呈政,又及。”^③这封信陈智超先生将其系于1927年。但《古名家杂剧跋》云:“余于去年冬闻桃源人家有藏书出售,以十二月挈舟往访……一九二八年冬十二月望日呵冻灯下书。”^④两相结合,知这一通余函似无可能撰于1927年,当以撰于1928年为宜^⑤。而本文所揭余嘉锡致赵、王二位函中所言之文章,最有可能就是这篇《古名家杂剧跋》。

如前所述,余函其实是分为两个部分。其下半部分是写给王重民先生无疑,则其上半部分必为致赵万里先生者。另据赵先生哲嗣等人所编《赵万里先生传略》,1927年12月,“(先生)应聘与浦江清等先生合编天津《大公报》的《文

①牟润孙:《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117页。

②《余嘉锡文史论集》卷前,岳麓书社,1997年,第1页。

③《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366-367页。

④《余嘉锡文史论集》,第577页。

⑤案:本文所引《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的两封信,在刘乃和等所撰《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也被分别误系于1927年和1928年(第246-247页,第258-260页)。

学副刊》”^①。而刘波博士在其未刊大著《赵万里传》中指出：“1933年12月3日赵万里致罗香林函提到‘大著提要已代登《大公报·文学副刊》，此星期可出版，想已见之矣’，表明到《文学副刊》1934年1月1日停刊前夕，赵万里仍然参与该刊的编辑事务。也就是说，他参与了六年间《文学副刊》从创办到停刊的全过程。”以此为线索，果不其然，在1929年3月25日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第六十三期中，正见余嘉锡此文，不过其题目与收入《余嘉锡文史论集》中者，略有不同，作《明刻续古名家杂剧残本跋》。

余函云：“弟拙著虽录入《文学副刊》，然以行篋无书之故，并通行之《汇刻书目》亦未之检阅。读《副刊》编者按语，深以为愧。归后即走访傅沅叔索书，渠云有友人陶君者欲暂假一观，因之未及取回。然少需时日，终当践录副之约也。”玩其辞意，可知余嘉锡当时其实并不知道这位《大公报》的编辑究竟是何人。而言《汇刻书目》云云，是指清顾修所编《汇刻书目初编》中曾著录有《古名家杂剧》八集与《新续古名家杂剧》五集的详目^②。两集计收杂剧六十种，均题玉阳仙史编。余氏此文的编辑按语起首即引《汇刻书目》立论，故余氏函中有此一说。函中又言“读《副刊》编者按语，深以为愧。”今将这一编者按全文录出，以见其详：

编者按：明陈与义《古名家杂剧》共八集，据顾氏《汇刻书目》所载，则金、石、丝、竹、匏、土六集，每集四剧。独革、木二集，每集八剧，故八集共收四十剧。又《新续古名家杂剧》分官、商、角、徵、羽五集，每集亦四剧，得二十卷。正、续二书，合计共收六十剧，应得六十卷。而王静庵氏《曲录》卷六云：“《古名家杂剧》八集、《续古名家杂剧》五集，共五十二卷，明陈与郊编刻。”余君此文之首亦引及之。王氏生平实未见陈与郊书，《曲录》所录，当亦据《汇刻书目》。而五十二卷云云，或忽于革、木二集独有八卷之事，而一时误记。故其《宋元戏曲考》旧名《宋元戏曲史》亦言《古名家杂剧》正、续二集，多至六十种也。此六十种中，有十二种确知为明人之作，三十九种与《元曲选》重复，余九种则可补《元曲选》之缺漏者。余君此文言，“且静庵先生所举不见于《元曲选》之八种。”按陈刻不见于臧刻者，实有九种。王氏除去其与《元人杂剧选》重复之《罗贯中龙虎风云会》，故但举孤本八种耳。惜其书传世甚稀，博雅之士如静庵先生者，亦不能晰其存佚。而余君忽于无意中得其续刻官、徵二集，虽云残本，然今日存世之元剧，赖之又增一种说详后。且藉以知玉阳所辑，尚在天壤间，安知他日无发见全帙之望！此研究曲学者所当拍案称快者也。余君文中有言：“考《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初无所谓《风云会》者，使其果有藏本，则将为陈与郊之刻本欤？抑《元人杂剧选》之

①赵芳瑛、赵深编，胡拙整理：《赵万里先生传略》，冀淑英、张志清、刘波主编：《赵万里文集》第一卷卷前，《芸香阁丛书》本，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②《汇刻书目初编》第九册，清光绪元年（1875）长洲无梦园陈氏重刊本。

本欤？若果为陈与郊刻本，将《古名家杂剧》之余书欤？抑仅《风云会》之单行本欤？皆不可知。吴瞿庵既不言其详，馆目又不著录，无从取证。”按江南图书馆有旧刻《元明杂剧》残本，为丁氏旧藏，中存杂剧二十七种，内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一本。吴瞿庵君所言，当即指此，非陈刻本，亦非单行本也。《元明杂剧》之内容，详见赵万里君《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序录》一文《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据赵君文，则余君所得《续古名家杂剧》官集中之《汉锺离度脱蓝采和》一剧，《元明杂剧》中已有之。故余君所得之八剧，惟元无名氏《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一剧，真乃海内之孤本也。顾氏《汇刻书目》录《古名家杂剧》及《新续古名家杂剧》，均著录每集所收剧名，不注撰人姓名。而杨守敬《丛书举要》则注撰人姓名，但亦有漏缺者，且恐难免传钞之舛误。如《续书》角集《刘晨阮肇误入天台》一剧，注马致远撰。王氏《曲录》著录为马致远《刘阮误入天台洞》。其下未注“有《续古名家杂剧》本”，亦未注“一作《刘晨阮肇误入天台》”等语。而于卷三明王（之）[子]一条，著录《刘晨阮肇误入桃源》一剧，据《太和正音谱》注云“《古名家杂剧》本”，但未注《古名家杂剧》作“天台”而不作“桃源”。是静庵先生信陈与郊所刻之剧，乃明王子一所撰，而非元马致远所撰也。究竟《丛书举要》是，抑王氏之见为是？吾人一时不能解答。今幸余君获得陈氏结集中之官集，其卷首载全书之剧目及撰人姓名，则此疑立可解答矣。希望余君能钞示本刊，一订《汇刻书目》、《丛书举要》、《曲录》之缺讹也。编者又闻人言，江南图书馆除《元明杂剧》外，别有陈与郊《古名家杂剧》之残本，其说信否未可知？倘有则宜可与余君所藏者，汇同校订而合刻，为赐于艺林当甚厚。日人之影印《元刊古今杂剧》及吴昌龄《西游记》，甚为士林之所推赏。而江南图书馆自柳翼谋君长馆后，印行秘籍，公之于世者，亦已有多种。《元明杂剧》一书，其中包有元曲孤本五种，余亦可供比勘。如久藏馆中，使研究曲学者莫窥底蕴，甚为可惜。若能提前付印，公之于世，则刊行中国古曲，不能专美于东邻，尤吾人之所渴望也。

按语对余文的批评，多中肯綮，故嘉锡先生于函中表示“深以为愧”。而现存于余氏文集的《新续古名家杂剧跋》一文^①，显然就是在吸取了编者意见的基础上重新修改的。虽然观点大略无差，但原文中所述诸事，如吴梅言及的江南图书馆藏品等内容，已经完全删节。余氏的勇于从善，于此一端，已经可见大概。其著作之流传至今，仍为文献学界不可忽视的丰碑，不亦宜乎！而于此又可见这个编者按语的撰者，其学识之不凡，更是一时之选。

另外，从函中所述可知，当时赵万里与王重民以余氏所藏《续古名家杂剧》残本存世甚少，欲为录副，以广其传。而余氏函中则答复云，书为傅增湘所借阅，并已转借他人。今考傅增湘曾著录此书云：“明海宁陈与郊广野刊本，分

^①《余嘉锡论学杂著》，第573-577页。

宫、商、角、徵、羽五集。今惟存宫、徵二集，每集四种。前半叶标四题于上，图画一幅附于下，与本事不尽合，聊以见意而已。王静庵《曲录序》曾称引此书，然谓今日皆绝不可睹。此帙乃常德余君嘉锡季豫得于桃源旧家，虽残缺不及半，要自可珍，异时当驰告诵芬室主人影刊传播之。”^①藏园此题，下存时间为“戊辰十二月”，则藏园借阅此书，至此已有数月之久，又此题识中，傅氏言“异时当驰告诵芬室主人影刊传播之”。而函中则言藏园以此书付友人陶君假观。故此陶君者，必为武进陶湘、陶洙昆仲之一。以董康与陶氏本属姻娅，刻书一事，多从商讨之故。但傅沅叔虽有此言，诵芬室刻书中却并无此名目，或许是因董授经当时的财力已经远不如前，且栖栖遑遑，亡命方且不暇，不及致力于此吧？不过，虽然董康没有翻刻此书，但赵万里与王重民为此书录副的想法，却应该是已经达成。今国家图书馆存有民国间摄影本《新续古名家杂剧》两册（索书号：32957），其细目为宫集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罗李郎大闹相国寺》、《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汉钟离度脱蓝采和》以及徵集的《河南府张鼎勘头巾》、《张孔目智勘魔合罗》、《玉清庵错送鸳鸯被》、《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与余季豫所藏正合。这两册书中虽然没有留存任何线索可供追索其拍摄时间，但结合本文所论之函，这个摄影本十有八九就是源自这次赵、王之请。而余致赵、王二人函之末，又有附言说：“正封函间，适奉贵馆赐函，所言已详此函中，恕不另行裁复。又及。”指的显然也是复制《新续古名家杂剧》一事，且又可说明赵、王录副之请，其实是代北平图书馆而发的。

据国家图书馆刘波博士《赵万里传》中所引材料可知，1928年1月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期刊出吴宓所撰《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称该刊：“言论及批评，力求中正无偏，毫无党派及个人之成见。其立论以文学之全部真理为标准，以绝对之真善美为归宿……重真理而不重事实，论大体而不论枝节，评其书而不评其人。”^②在副刊发行的六年中，这一宗旨一直被几位编辑严格遵守，因此每篇“言论及批评”，均能引起学人的重视。这从余嘉锡先生信中第一段对于编者按语的评论以及事后修改成文这一现象，都可以看出。那么，编者按语究竟是谁所撰呢？

据《吴宓日记》，1929年1月19日中午，吴宓在家中宴请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三人，商谈《文学副刊》改办计划，其要点之一为：“改总统制为委员制。即一切不由宓一人主持，而由诸人划分范围，分别经管。对于该类稿件有增损去取之全权，宓仅负集稿编次之责。”^③也就是说，几位编辑各自负责的，都是自己熟悉的领域。再根据刘波博士研究，《文学副刊》的编辑，到1929年时，先后计有吴宓、浦江清、赵万里、张荫麟、王庸、朱自清六人。今考余文所论内容，在此

①“新续古今名家杂剧五集 存二集”条，《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曲类”，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1页。

②《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期，1928年1月2日。

③《吴宓日记》第4册（1928—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7页。

六人中,再没有比赵万里更为熟悉的了。赵氏不仅亲炙王国维,饱聆其叙论;更有多种与俗文学相关的论文行世,这一点,只要翻看《赵万里文集》,便可了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编者按语中,作者对于王国维极为回护,如王氏《曲录》卷六云:“《古名家杂剧》八集、《续古名家杂剧》五集,共五十二卷,明陈与郊编刻。亦多与《元曲选》复出,并刊及徐渭、汪道坤之作。”^①五十二卷之说,显然是个比较低级的错误。而编者于此,则颇有理解之同情,言其不过是“一时误记”而已。综上所述可知,这篇编者按语的作者,应该就是赵万里本人。

前面已经提到,余嘉锡在看到按语之后,曾经改写其文,内容多有改动。如旧版所言的有关江南图书馆藏本的文字,都经删落。但赵万里对其原文中提及江南图书馆藏书的情况,显然颇为关注。事实上,赵氏曾于1923年秋,专程访书龙蟠里,并成《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序录》一文,于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元明杂剧》有所介绍。余文一出,怀疑江南图书馆尚存《古名家杂剧》残本,难免使得赵氏再次关注到此馆的藏品,故而在按语中呼吁江南图书馆能够影印所藏《元明杂剧》一书并《古名家杂剧》之残本(如果确实藏有该书的话)。而就在这年的下半年,江南图书馆乃将其所藏之《元明杂剧》影印行世,公诸大众。其馆长柳诒徵(字翼谋)作跋文云:

盍山图书馆藏元明人所制杂剧六册,无编者字氏。全书都二十七种,卷第糅杂不可考。版心或不标卷数,或仅刊卷字,或题一卷二卷,或曰信卷三、信卷四,行格大致相同。惟不记卷数者,中幅卷数皆顶格。记卷数者,中幅卷数皆空一格。疑非一时所刊,或本非一书,丁氏汇而目为《元明杂剧》耳……其罗贯中之《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及无名氏之《汉钟离度脱蓝采和》见近人所得陈与郊《古名家杂剧续集》,未知有无异同……己巳冬十月柳诒徵。

观其辞意,正是对于余文及赵氏按语的响应。而跋文中于大家关切的该馆是否藏有《古名家杂剧》残本一事,并未提及,这也从侧面表明该馆其实并无此书。

三

余函的下半段,如前所言,是写给王重民先生的。从信的内容来看,是在回答王氏关于周亮工、李清著作被撤出《四库》的原因。这一问题,王氏曾举以询陈垣先生,陈氏也有简略答复。而王重民的《李清著述考》一文,正是由此而作者。关于这一故实,王重民自己在民国二十年七月二日所撰的《四库抽毁书提要稿》前言中,也曾言及:“民国十六年春,余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得窥方略馆藏书,见有《四库全书》清缮本十数部,每部或有二三重份,颇讶《四库》何以

^①王国维:《曲录》卷六,民国二十一年第三版,第174页。

有零种？并何以留置此许？及检《总目》，概无其书，而俱见于《四库简明目录》。当时余认为在《四库全书》史上当为一极有趣味之问题，即请教于陈援庵先生，蒙钞示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起居注一则，得知其底蕴。因草《李清著述考》一文，布之《图书馆学季刊》。嗣见余季豫先生言及此问题，余先生更询于陈先生，又得钞示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档及五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档两则。于是此案原委，概可知矣。”^①王氏文中所述的“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档及五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档两则”，后来都经其录入《四库抽毁书提要稿》之中，作为该书的附录，以为供读者了解当时事实的一手材料。正是因为这些档案具备这样的功用，余函中才会说：“得此，则所钞未刻提要亦可发表矣。”王重民所钞的这些未刻提要，包括李清著作三种、周亮工著作四种和潘耒章、吴其贞著作各一种^②，都是四库馆当年抽毁之书。而陈垣钞示余嘉锡的两份档案，所言正是抽毁的原因。故而，余氏以为，得此档案，则王重民之书可以发表矣。可惜的是，余函中也曾提及这些档案的另一功用，即可以补充《李清著述考》一文不足的事情，却似乎没有下文，直至《冷庐文薮》中所收的《李清著述考》，依旧未曾改动、增补。

《四库抽毁书提要稿》之后，存附录三种，其一为上引陈垣致余嘉锡函及所附乾隆五十二年二日档，档后还附有余嘉锡的按语，就是余函中说的“鄙见所及亦附案语于后”。其云：“嘉锡案：据乾隆五十二年军机大臣奏，则《四库全书》修成以后，凡有撤去之书，有以备钞之他书补入者，有别无备钞之书，但以衬纸匀称其卷帙者。今以其说考之《总目》与赵刻《简明目录》，此单所开各书及书影同书二种，均见于《简目》，而《总目》无之。援庵原函叙之已详。其《总目》有而《简目》无者，除钦定之书随后续入者不计外，‘史部·别史类’有李锳《尚史》一百七卷、‘子部·类书类’有潘永因《宋稗类钞》三十八卷，皆在每类之末。盖即原奏所谓‘别史、类书二类备钞之书尚多，均可按其时代，另检别种，约计卷数多寡，依类补入，不见抽换之迹者’也。故《提要》于此二书，皆颇致不满，其不得已而取以充数之意，可于言外得之。惟是李清、周亮工等之著述，以触犯忌讳，遭焚毁之祸。而《尚史》、《宋稗类钞》，乃得以中材承乏，是亦艺林故事之可资谈助者矣。著作之传，亦有幸有不幸，诎不信哉！至其它各类，则皆有撤无补，盖以卷帙不多，可用衬纸之法通融办理也。”^③对于这一奏折的内容解读，异常精切。而他的这些心得体会，后来又被吸收加入其名著《四库提要

①王重民：《四库抽毁书提要稿》，《无锡丁氏书目丛刊》之一，医学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叶十。

②详目为：“史部别史类”李清《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史部载记类”李清《南唐书合订》二十五卷；“史部地理类”周亮工《闽小记》四卷；“史部史评类”潘耒章《国史考异》六卷；“子部艺术类”周亮工《读画录》四卷、吴其贞《书画记》四卷、周亮工《印人传》三卷；“子部杂家类”周亮工《书影》十卷；“子部类书类”李清《历代不知姓名录》十卷。

③《四库抽毁书提要稿》，叶十二至十三。

辨证》之中。如“宋稗类钞三十六卷”条云：“案：引书不注出处，既大乖著述之体，况其采辑编次，又复意为出入，以致庞杂如此，其书不过兔园册子之流，何足以资考核。考杭州刻小字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赵怀玉就四库馆初稿录副。鲍氏知不足斋据以付刻，与湖州沈氏刻本不同。卷十四类书类有李清《历代不知姓名录》十卷、《诸史同异》六十八卷、周亮工《同书》四卷，而无此书。胡虔所编《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即《总目》内存目之书类书类有《宋稗类钞》八卷，国朝潘永因撰。《总目》无李清、周亮工所撰三书，而《宋稗类钞》则著录文渊阁，不附存目，彼此参差不合。考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档奏请撤出销毁书单，则此不著录之类书三种皆在其内，并于《诸史同异录》条下注云：‘李清撰，因书内妄称世祖章皇帝有与明崇祯相同四事，悖诞不经，前经奉旨将全书销毁，并将李清所撰各书概行查毁。’又于《读画录》条下注云：‘周亮工撰，因诗内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馀”，语涉违碍，经文渊阁详校签出，奏请销毁，并将周亮工所撰各书一概查毁。’又据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档，军机大臣奏知当时于《四库全书》内撤毁之书，即于本类备钞书内，按其时代，另检别种，约计卷数多寡，依次补入。若本类无备钞之书，则于书内衬纸匀装空匣之内，不必再补，于刊刻《总目》时，一并查明改正。原奏并谓子部类书类中备钞之书尚多。以上所引档案，乃吾友陈援庵垣钞以见示者。此《宋稗类钞》者，盖即所谓类书中备钞者也。其先本入存目，后因《历代不知姓名录》等三书被撤销，乃以此书补入。又因被撤之三书，凡为卷八十有二，而此书原本只八卷见前，不足以填满空匣，乃析为三十六卷，傅氏谓为后人所分析，余疑即出四库馆臣之手。于每叶内加以衬纸，俾与匣内原盛之册数约略相当，而此订短钞撮之短书，乃得杀青缮写，登诸中秘矣。”^①于《四库》抽换书之原委、方法等，都解释得极为透彻。

回首余嘉锡致赵万里及王重民函，至今已近90年。而陈、余、王诸先贤早已指出的《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简明目录》之间的区别及其缘由、《四库全书》撤换书籍的原因及方式、方法等，虽有个别别具只眼的学者曾加论述、阐发^②，但总体而言，与方兴未艾的“四库学”研究相较，实在不成比例，亟须加强。

四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1929年3月29日余嘉锡致赵万里与王重民一函，不仅可以得知余氏发表、修改《新续古名家杂剧跋》一文的全过程，且藉以发现陈垣和赵万里均有一篇佚文未经收入各自的文集。这封信虽然与陈垣没有直接关系，但事实上他却是余、王二人话题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材料提供者。因此，虽然仅仅是寥寥三数百字的一封短笺，但对于研究陈、余、赵、王四人的交游以及学术的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无疑是一件最好的实物证据。尤其是其间反映

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5-846页。

②秦秦：《四库撤出本周亮工〈印人传〉探赜》，《史林》2014年第4期，第68-72页。

出来的陈、余之间的友谊,更是值得深入发掘。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中,曾引用《启功口述历史》中的印象之辞,以为余嘉锡之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全因陈氏赴京参评前夜,余氏之子让之登门与之彻夜长谈,介绍乃父学问^①。但从本文所引诸材料来看,陈、余二贤,在余氏入北平未几,即已惺惺相惜。若陈垣以所知密档无私抄录余氏等事,岂是泛泛之交所可愿为者?何况,余嘉锡之入辅仁大学授课,即是出于陈垣所荐^②。若非于余氏学术甚有了解,岂能自坏长城,援引入校?而既然彼此久已深相契合,又何俟临时抱佛脚、匆匆于事到临头而使亲子为说客耶?其不合常理,也是一望而可知者。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先后承同门复旦大学研究员睦骏博士、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罗璋博士及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睿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明博士、四川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丁伟博士、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栾伟平博士代为核查数据,又承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波博士见示未刊大作《赵万里传》相关部分、天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胡艳杰博士代核《大公报》,凡此诸事,具见众人高谊,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柳向春,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①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余嘉锡”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8-92页。

②1928年11月20日余嘉锡致陈垣函,《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第366-367页。